

觀察·隨筆

革命之外的歷史光景：談陳耀成的紀錄劇《大同：康有為在瑞典》

● 黃克武

長久以來，海峽兩岸的人們在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時，主流的歷史論述均對「革命」抱持高度評價，而貶低晚清以降改革派（或改良派）的貢獻。在革命史觀之下，「辛亥革命」以及日後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乃至近代以來的各式「革命」，均在現代中國的形塑中被賦予歷史正當性與崇高感。因此，晚清以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其獲得的關注和歷史評價，始終高過康有為、梁啟超等改革派人士。1995年，李澤厚、劉再復兩位知名學者的對談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出版，引發學界重新評估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此後，反省革命的聲音逐漸出現。2011年，適逢辛亥百年，華人世界舉凡政治圈、學術界，甚至是藝文界，均透過文字、影像、展覽等「儀式」，對這場革命及其締造的民國，進行各式紀念。然而「儀式」的中心，仍是環繞着「孫中山」、「革命」、「建國」等幾項傳統議題。

就在人們多採革命視角慶賀辛亥革命和民國百年的同時，影壇出現了一部以康有為作為主角的影片：《大

同：康有為在瑞典》（2011）。祖籍廣東南海的導演陳耀成出身香港、移居美國。他從海外華人的視野，透過康有為在清末民初的言行，構築一個觀察中國近代史，或者所謂「一百年中國人苦難歷程」的特殊框架，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同於「革命史觀」的視角。觀影者得以藉由康有為、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與梁啟超的生命歷程，以及他們的思想遺產，看見「革命」以外的歷史光景。

以歷史劇而言，這是一個難度很高的挑戰，而現今所呈現出來的，則是一部敘述生動、剖析敏銳，且寓意十分深刻的作品。誠如監製人焦雄屏對影片的定位——「紀錄劇」（docu-drama），是結合了紀錄片與戲劇形式等要素而搏成的歷史論述。亦即，觀眾能看到紀錄片應有的素材：豐富的珍貴照片和歷史材料以及幾位專研中國近代史的知名漢學家，如德里克（Arif Dirlik）、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等人的論述；同時該劇起用三位演員分飾康有為、康同璧和梁啟超，以第一人稱發聲，取代一般紀錄片的第三人稱旁白。這種形

式上的交織穿插，加之導演對於歷史細節與精確度的講究，以及歷史敘述之觀點的拿捏，造就了這部內涵豐富的歷史紀錄劇。質言之，《大同：康有為在瑞典》不單是一件藝術作品，它還展現了層次豐富的歷史議題，因而成功地結合了「歷史的真」與「藝術的美」。

本片觸及的歷史課題約可分為三個面向，而這三個議題，卻又不約而同地與陳導演對現在的反思及未來的關懷交織在一起，並聚焦於「革命史觀」的顛覆與翻轉。

從第一層次上說，首先，陳導演以康有為作中心的歷史敘述與兩岸的主流論述皆不相同。在台灣，國民黨史觀的歷史書寫，環繞着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與國民黨的革命事業，如何在歷經挫敗之後得到成

功。這種論述忽略了革命黨內部的分歧，尤其是湖南與江浙革命志士之角色，以及改革派（立憲派）等人對辛亥革命的重要貢獻。

中國大陸方面，革命也是共產黨史觀的核心。只是，辛亥革命之於共產黨人乃一階段性的任務，他們將之視為「資產階級革命」。而辛亥革命的失敗，按照馬克思主義史觀的描述，是為了迎接一場更加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中國的到來。

質言之，這些以「革命」為中心的歷史敘述，目的在以單一之視野來合法化各自服務的現實政權，並污名化其反對者。這樣的政治化史觀使我們較難確實了解康有為和梁啟超等改革派以及其事迹。

相較於革命視野之偏狹，這部影片談到康有為、梁啟超與深受海外華人支持的保皇會的歷史，並介紹他們「反革命」的政治理想與背後的理路。例如關於保皇會的歷史，一直是歷史教科書中被負面批判的對象。在陳導演掌鏡下，觀眾遂得以知曉，保皇會曾經在世界各地成立為數甚多的分會，幾乎獲得全世界海外華人的熱烈支持。康有為與梁啟超到世界各地演講時，幾乎都是萬人轟動、慷慨捐助的場景。這在以孫中山及革命黨人為中心的歷史書寫下，鮮能見之。

簡言之，這部影片打破了一元化的革命史觀框架，從更多元的角度來討論中國近代史的進程，由此可以重新反省吾人對中國近代史上改良與革命、保守與激進的歷史評價。

其次，在轉換視角後，陳導演更進一步剖析了清王朝的性質，以及帝國末年所面臨的族群統合問題。這部分主要環繞着清朝建立以來中華帝國的民族問題而展開。影片中反覆地釋放此一信息：中國當時是一個多民族



《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海報

的帝國，由漢滿蒙回藏等民族混雜共組而成。就此而論，辛亥革命期間帶有民族仇恨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便顯得太過單一化清帝國秩序和重建的課題。

我們反思晚清時期，清帝國面臨最大的挑戰實為如何重新安排大中華帝國秩序，並展開現代的政經轉型，對此，康、梁兩人有過深刻反省。1904至1907年間，他們與革命黨人在其各自創辦的《新民叢報》與《民報》上，展開過一場大辯論，其內容就顯露出雙方對滿漢種族衝突問題、經濟發展、社會正義等議題的歧見。其中，最尖銳的歧見在於是否要排滿，並重建漢族全面主導的霸權統治。誠如片中巴斯蒂教授所言，孫中山和康、梁二人不同，孫對於失去東北、西藏與新疆等疆域，均不甚重視。至今，中國邊疆在領土主權、族群衝突、宗教信仰等問題上面臨的困境，一直都是政府的困擾。此亦反映出，一百年前康、梁與革命黨人之間，對於多元種族如何在中國境內安排的論辯，到今天都還有省思的價值。

本片觸及的第二個層次的議題，則是關於「漂泊與流亡」。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離開故土，1904年輾轉與女兒康同璧到北歐的瑞典旅居長達四年之久。在他所居住的小島上，康氏仍持續在思索中國的未來。康有為於晚清之際的漂泊、流亡之體驗與心情，到了二十世紀90年代之後，仍籠罩着中國知識份子。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大量流亡海外，他們也同康有為一樣，在思考現代中國面臨的諸般課題，並提出批判與建言。當然，陳導演在美國二十多年的生活經歷，與此也可說是若合符節。對他們來說，中國不但是居於神州大陸人們的國度，也是許多



劇中的康有為

海外華人(包括港澳與台灣人士)神牽夢繫的家園。以上幾代中國人，所處的時空環境雖大有不同，但他們對故土的懷念和關切，卻十分一致。這也牽涉到，現今這些自願或非自願流亡海外的華人，他們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國，以及中國對海外的不同意見又該採取何種態度。康有為之不容於清末民初之革命黨，也恰如海外異議人士之不容於中共當局。

第三個層次，也是最深沉的一個議題是這部紀錄劇的主標題：「大同」。此一概念出自《禮運·大同篇》，代表着兩千多年以來許多中國士子所追求的理想。近代以降，如太平天國對土地制度、女性地位的想像，以及康有為寄託在《大同書》中的理想政治社會之藍圖，無一不投射了「大同」概念於其中。質言之，他們都是站在中國傳統思想基底上，祈求一個平等、共有、共享的世界。在此理想中，既有經濟上的富裕，又帶有人道理想的追求，是一個「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境界。這個帶有濃厚烏托邦色彩의 夢想，在康有為

的時代甚至是民國肇建之後，都無法實踐。

在這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陳導演將近代中國追尋大同世界的線索，從康有為拉至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上。這一點可謂十分關鍵。過去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多半僅注意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與中國共產黨之關聯，鮮少注意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對這個西方思潮中國化所產生的影響。此即意味着，傳統中國人對大同世界的想像，對於晚清乃至1949年以來烏托邦思想之形成，仍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回顧二十世紀，在追求現代形式之「大同」時，我們可以說，整代中國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如今大同安在？

相較於在《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嘗試追索現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的源流，陳耀成的另一部片《康有為二三事》(2012)，則試着反省：當代中國該如何重新思索「大同」應有的意義。影片裏有一段話：「中國的社會主義被全球的資本主義吸收。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工場，最重要的美國蘋果電腦公司的供應商。」換言之，現今中國大陸所關心的，似乎仍僅是國家經濟力量乃至軍事力量無限擴張的現實課題。的確，「尋求富強」一直是現代中國的核心課題。無論是革命黨人，抑或是康、梁等改革派人士，他們的主要關懷均源此而生(康有為曾提出「物質救國論」)。然而，如何在「衣食足」之後能「知榮辱」，在富強之後，追求終極關懷？

我們可以看到，康有為是以「大同」為立足點統合物質、精神、藝術與人道；當代中國則異化為一個將「大同」所包含的平等、互助、友愛等價值逐漸揚棄的國度。中國的馬克思

主義者所曾堅持的理想究竟還值不值得追求？我們又應如何在富國、富民之時抗拒資本主義的邏輯？《大同：康有為在瑞典》中對「大同」理想的反思讓我們去思索：「大同」作為一個理想，它還有怎樣的義涵，尤其在經歷整個二十世紀烏托邦實驗的挫敗及災難之後，我們該如何再去追求「大同」？

許多人都告訴我，他們在看這一部影片時感動得落淚。這種歷史的感動源自於康有為一生所經歷的苦難與所編織的夢想。誠然，無論是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康有為的追求，抑或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關懷，都是一種烏托邦的夢想，其中充滿了理想的誘惑性與危險性。該片之中另一人物梁啟超，以及片中沒有觸及的一位改良派知識份子嚴復，則出於「幽暗意識」與人文主義的價值，對烏托邦思想有較深的警惕。這樣一來，中國的未來不在於追求一個沒有特權腐敗、沒有政客與小人、沒有人際衝突的理想社會，而是像其他現代社會一樣，一方面追求物質進步與精神提升，另一方面則在處理生活幽暗面所引發的問題中，期盼着具有可行性的點滴改革。這是梁啟超在三十歲之後不談康有為的「偽經」、「改制」，其後「康梁學派遂分」，梁啟超揭櫫「調適」的智慧。這一反烏托邦思路是近代思想史上的寶貴遺產，值得再做省思。

總之，陳耀成導演的《大同：康有為在瑞典》，讓我們得以見到革命之限制與革命之外的歷史光景，並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康有為的頓挫，以及百年來中國人所歷經的理想與幻滅。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